

学习领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

刘守英， 赖德胜， 都 阳， 张永生， 季为民

[编者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遗产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为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深化历史文化研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中国工业经济》策划了专题笔谈，邀请5位学者交流学习体会，从经济学研究者的视角为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性阐释和探讨。

[关键词] 文化传承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工业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3)07-0005-21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3.07.012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刘守英

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文化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中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引起关注，现代化必然包含文化的现代化。只有建立起基于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文明，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

一、现代文明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于这场革命性转型的主流解释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进步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人均GDP增长大大快于人口增长，

[作者简介]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2022年度重大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人类进入一个由技术驱动的现代增长世界^①。后者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套适宜经济发展的制度装置的结果,包括精心设计和受人尊重的产权、有约束力的合约、健全的法律及规则、良性的政经互动^②。但是,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的制度,而其他地方却适得其反?

近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对长期经济变革的影响是重要的。文化被定义为一套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③。信念是关于世界中实际的(真实的)自然的观点,价值观是关于伦理及意识形态等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陈述,偏好则是关于个人事务(如消费等观念)的规范性陈述。人们的社会态度、信念和偏好能够促进合作、互惠、信任,以及形成有效的经济运转模式^④。人和人之间信任的增加与合作的加强会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商品交易和形成运作良好的市场,不同程度的信任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⑤。

文化和信仰与技术进步和创新有直接联系。现代经济增长被莫基尔解释为主要是由启蒙运动时期“有用知识”的广泛应用所驱动,文化变革使西方所经历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创造并培养出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散的制度。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们的态度和天赋,态度决定了哪些人会花费心思和力气解释他们周围的自然世界,天赋则决定了是否能够成功将他们的解释转化为更高级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创新型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观念。如果一种文化将任何智力创新视为离经叛道、亵渎经典,技术创造力就会受到限制。

将重点放在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上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信任、诚实、合作、节俭、公益心、法治等现象可以解释大量的经济表现,贸易、劳动分工、劳动力、信贷及土地市场,以及与斯密增长中相似的制度安排的产生都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他人价值观及行为的理解^⑥。文化有助于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会出现,尽管它不能保证结果如何。制度创造了文化演变发生的环境。制度在社会中创造出—个激励结构,信仰和偏好是制度中的“支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建了制度形成的基础,因为文化为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制度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机制反作用于文化信念^⑦。社会的激励结构是基于一些观念所构建的,有些观念是关于自然的,有些是关于人际互动的,还有一些是道德性的。换句话说,制度所依赖的根基就是人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信念。如果

①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1), 65-94.

②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M].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2.

③ Boyd, R., and P. J. Richers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Bowles, S., and H. Gintis. 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8, 63(6), 2557-2600.

⑤ Zak, P. J., and S. Knack. Trust and Growth [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0), 295-321.

⑥ Mokyr, J.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⑦ Alesina, A., and P.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53(4), 898-944.

文化与制度不一致,这一根基就不稳定。如果文化和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某些制度的基本信念或合法性已经不再牢固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政治不均衡。

从历史经验看,现代化源于对现代世界的新认识而形成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发展观。文艺复兴思潮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倡导科学文化精神,摒弃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主张理性主义,为西欧现代化带来启蒙。宗教改革使人们摆脱天主教会的束缚,倡导进取心,追求物质丰裕,助推企业家精神,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精神动力。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革命,商业精神的发展使西欧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正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叛,宗教、哲学等主要的文化及价值体系日益分化,人们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改革、重视专门技术、尊重和自重,将人类推向了现代化的征程。

二、中华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外力所推动。挨打和受欺凌的局面使现代化的推进者更是将落后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弊端,因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革命成为现代化的主流。然而,进入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必须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价值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数千年的中国价值传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只有彻底突破传统,批判传统,最终放弃传统,现代化才能实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早期领导人旗帜鲜明地认为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已成为“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只有掌握“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才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①。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恢复旧道德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驳斥其是企图“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②。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中国,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传统中拔出。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反封建,在社会动员中,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价值观,让更多的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倡议:“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③,强调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以切断历史,否定传统,而应该继承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学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割断历史”^④,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并号召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选择,决定哪种学说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⑤

① 参见《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1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25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801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提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①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提出既要学习国外长处、也要重视民族传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②。毛泽东把“现代科学文化”作为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同等重要的内容^③,明确提出建设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遗憾的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粗暴态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和实现现代化。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这一时期,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化和物质现代化的观念、价值和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④,明确“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政策。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人要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分辨出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中国几千年来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期重获新生^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突出优势,具有深厚的文化内蕴和强大的传承力,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传统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随着现代化程度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本土文化价值更加彰显,现代化的主体文化特性更强。到了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建立本民族文化主体价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348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83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11页。

④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58页。

⑤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建构现代化强国的文化主体价值。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从中吸取内在精神价值和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增强文明互鉴。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我们越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是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就越需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并共享中国价值。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既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又是吸纳外来文化文明精华、推动中华文化不断丰富过程。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要深入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秉持开放包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以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赖德胜

经济发展是资源禀赋的函数。资源禀赋既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蕴藏等,也包括文化资源禀赋,如文化遗产、思维方式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这说明,中国文化资源禀赋非常丰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色。

一、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智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中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两个结合”也是创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一奇迹的重要密码。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面临的问题和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种复杂背景下求出发展最优解,必须更好推进“第二个结合”,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中获取智慧,增进信心。

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两个结合”的集中体现,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决定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比较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发展中爱护自然、敬重自然,自然也给予我们发展所需的各种环境和资源。期间孕育出了很多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例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观,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生物多样性观,孟子的“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观等。人类历史表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很多古老文明衰落甚至是消亡了,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过分利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古巴比伦文明、复活节岛文明、古楼兰文明等。高质量发展一定是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现绿色发展,要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说明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阻而不断发展,靠的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我们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更有无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体制机制创新,创新可以说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始终,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些“无中生有”或“有中更好”的科技进步,蕴含着以善统真的科技理念和求真务实的创新思维。例如,四书之首的《大学》讲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来很多科学大家的创新故事

【作者简介】 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都证明了这种知内达外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无创新就无高质量发展。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要坚持将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位置,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实现创新发展,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守正创新,走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说明中华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化是融为一体的,这“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①这种统一性的内在追求,可以说几千年一以贯之,深深融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诗经》所记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所记载的“协和万邦”,《汉书》所记载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朝所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都是明证。我们今天强调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要使各地区各民族协调发展,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更多增长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通过协调发展,打通堵点淤点,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说明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是开放的,是商贸流通和人员流动的推动者;是善于学习的,在与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中不断进步;是和平的,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追求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左传》中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强调开放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提高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发挥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提供更多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我们不仅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要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为此,需要不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已经从“有没有”进入到“好不好”的阶段,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这需要文化产业有更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文化产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它们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赋予其时代价值,为不同人群提供更具匹配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近些年,很多地方结合当地独特历史文化资源,走文旅融合之路,可谓风生水起,既叫好又叫座,在满足人民需要的同时,推动了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一道靓丽风景。未来,要

^①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文化产业创造更好条件。同时,要发挥数字技术等新科技对文化产业的赋能作用,不断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成为世界工厂,成就了“中国制造”这一响亮品牌。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应地,要更好发挥文化资源禀赋的优势,打造“中国智造”的品牌。这其中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如何更好发挥工匠精神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有很多历史文化遗存,其精致精美程度,惊为天人。其背后其实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中国制造”走的是价格低廉之路,“中国智造”则走的是高品质之路。高品质当然需要科技创新做支撑,但工匠精神不可或缺。要传承并发扬光大工匠精神,将工匠精神转化为产品的高品质。二是如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中注入更多中国文化元素。中国元素在历史上帮助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不断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元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表现。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提升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溢价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之治”走向新境界的重要滋养。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实,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得不到实惠,社会很难长期稳定。同理,没有社会稳定作为前提,改革不可能深入推进,全球资源不可能持续汇聚,经济也就不可能长期快速发展。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2021年发布的《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在全球11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安全指数排名第二,而且是排名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中,唯一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之治”已成为全球典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推动“中国之治”走向新境界,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例如,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强调“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载舟覆舟”的忧患意识、“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等。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之治”应对“世界之乱”,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三、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拓展理论创新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高质量发展既有各国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例如,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程度和难度都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然也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些许借鉴,也可以从西方理论得到些许启示,但根本上还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极大地拓展了高质量发展理论创新的文化空间。

例如,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西方经济学多有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也进行了诸多实践,涌现出了多种所谓的模式,但效果都有限,一个突出表现是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分化,富裕中的贫穷现象愈发凸显。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研究,21世纪初,美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成一个分层的社会,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国民总收入的65%。^①中国具有崇尚共同富裕的悠久传统,2000多年前的《礼记·礼运》中就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孔子则更是直接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因此,改革开放后,面对贫穷落后的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同时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共享发展,要求改革发展成果要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补齐“短板”,其中,最大的“短板”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为此,打响了史诗般的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强调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是能够实现效率和公平相互兼容发展、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既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在不远的将来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梦想变为现实。

在推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②从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经济研究中心会伴随着经济中心的转变而转变。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研究的中心已经发生了多次转变,但每次转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成为经济研究中心者,必有该国历史文化的加持。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指出的,“经济分析”是由历史、统计和理论三门基础学问构成的。^③离开历史文化,经济学发展就没有了根,当然也就构建不起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更不可能成为经济研究的中心。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加快推进,中国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和成为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创造了基础。同时,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和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这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根脉和底气所在。

① 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② 参见谢伏瞻:《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与经济学人的使命——〈中国经济学手册·导言〉》,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

都 阳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因素与文明的演进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人口因素同样居于重要地位,尤其需要通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支撑和推进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一、中华文明的延续伴随着人口发展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文明的连续性与人口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马尔萨斯经济时代,人口规模涨落与文明兴衰有着互为因果的关联。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高度重视人口发展的问题,在发展的早期就注重人口统计,大量的历史文献包含人口发展的各种丰富信息。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看,这一特征也尤为明显,中华民族更加重视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较之其他文明,有更全面的历史人口信息,较早开始人口调查并记录人口发展结果,这些做法都是很好的例证。

有史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最早的、准确的全国性人口统计始于西汉时期,公元2年全国人口为5959万人。以此为起点计算,一直到1900年,中国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规模的比重保持在20%—30%^①。图1显示了中国和西欧在历史上的人口规模变化,可以看到,以人口数量计,中华文明的规模一直在欧亚大陆居于前列,16世纪时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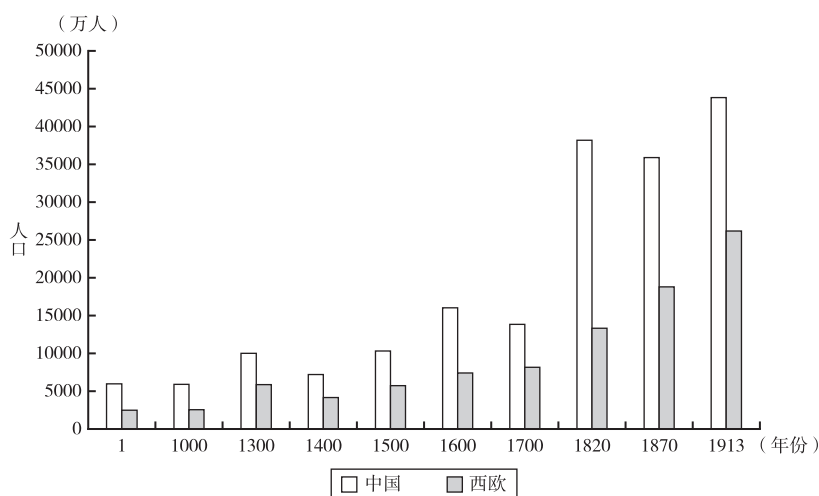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西欧的历史人口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简介]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表4-1。

欧亚大陆上各个文明的发展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出现以前,很难精确度量经济规模,也难以反映各个文明在经济上的相对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规模本身就是反映经济规模和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文明的人口达到较大规模,不仅说明该文明具有供养大规模人口的食物供给能力,也反映了更强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经济体系中各种生产关系也越复杂,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配置能力的要求也越高。此外,人口规模越大对应的社会关系也越复杂,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备性和治理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因此,中国一直以来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本身就已经表明,中华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世界文明前列。

人类历史上人口因素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数千年的经验佐证了更快速的技术进步与更大的人口规模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①。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可以促进全社会各个生产要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原生动力。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口规模甚至是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决定力量。有学者认为,中国一直保持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创新发明的数量和种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位居世界前沿的关键因素^②。正是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创新的前沿和中心。铸铁、深钻技术、马具、火药、罗盘、纸张、活字印刷、船尾舵等技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这些技术的传播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力量^③。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文明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离不开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从经济发展动力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峰后,至2022年累计减少了4642万人,对劳动供给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资本投入的回报必然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使命。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供给的质量,实现高技能劳动力与蕴含创新的资本要素的互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价值取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文明达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

① Kremer, M.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681-716.

② 参见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278页。

③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关键环节。既往的实践表明,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缩小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个体人力资本差异是引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提升教育水平、扩展工作技能等手段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既是人文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的重要途径。文明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的丰富,也包括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精神富有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文明水平达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三、在全生命周期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人口高质量发展贯穿其中。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结合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中国人口发展的具体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方略。从人口的队列效应(Cohort Effect)看,人的发展经历各个生命周期,其发展过程在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即使是静态地观察人口发展问题,由于存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口队列,也需要以系统观念制定总体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规划。当前,从全生命周期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尽可能提升生育率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离不开人口规模的适度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技术进步的速率内生于人口规模,无论是基于内生增长模型还是半内生增长(Semi-Endogenous Growth)模型,人口负增长都将使得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收敛至稳态水平,出现增长停滞^①。换言之,人口规模的适度增长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或缺的正外部性。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突出体现为人口转变的结果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自发达到的人口结果。例如,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和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和人口快速老龄化、总人口达峰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等都体现了上述特征。中国人口转变较之世界平均水平更快,且产生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口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29。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22》数据,中等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16,中国以外的中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90,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56。可见,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升生育水平是今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要把提升生育率作为人口均衡发展的核心,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实施针对性的政策,努力提振生育率水平,以下两方面的政策有着突出重要的作用。一是要解决生育行为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冲突,有效提升生育意愿。综合使用生育补贴、所得税抵扣等手段,在提升育龄女

^① Jones, C. The End of Economic Growth?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Declining Popul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11): 3489-3527.

性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鼓励其生育行为。二是加大0—3岁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生育、养育的成本,提升生育率。通过有效提升生育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保持人口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优化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创造良好的条件。

2. 加强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积累

不断提升全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民教育体系当然是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不再仅仅与特定生命周期相关,而是应该在全生命周期予以关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建设的形式、内容和难度都在不断变化,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Heckman曲线所揭示的,0—3岁的人力资本开发对于终身的人力资本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①。因此,加大对0—3岁年龄段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仅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也能对提高全民素质产生更有效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在生命周期后期阶段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提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仅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健康余命的延长,可以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资源不足的压力。

3. 统筹协调各阶段的政策体系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各个方面政策逐步形成。但由于政策体系的设计总是针对特定阶段、由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口发展政策难免存在衔接不畅、统筹不足的情况。当前,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扩大增量资源投入,而在于加强各个阶段政策体系的衔接,提高现有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

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的统筹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做好婴幼儿照护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的统筹与协调。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生命周期看,婴幼儿照护体系本身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系统观念统筹协调二者的关系,可以使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更有效率,获得更好的回报。二是要做好教育体系与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的协调。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结,更好地利用劳动力市场信号配置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目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手段,这需要不同部门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加强统筹。三是处理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扩大就业的关系。既要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充实的经济资源,也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养老金申领体系,使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① Heckman, J.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J]. Science, 2006, 312 (5782): 1900-1902.

中国文化引领工业绿色转型

张永生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文化是一种信仰、价值体系,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各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都必须建立在其文化基础之上。实际上,在洋务运动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时,争论的核心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同工业化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绿色转型证明,中国文化不仅适应传统工业化模式,更能为解决其危机提供出路。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尽管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但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转向新型工业化。这种转型需要回答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实现工业化、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这背后是文化或价值观念的问题。

一、传统工业化不可持续的文化根源

1. 传统工业化模式兴起及其不可持续的文化根源

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同之前农业时代的传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幅提高,就必须为大规模生产开辟市场,而农业时代形成的节俭消费心理和消费模式,就成为大工业生产方式最大的阻碍之一。

为此,工业化的前提就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系统性转变。其结果就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石,财富成为事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毫无疑问,工业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传统工业化建立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缺乏制衡机制的工业化无限扩展,就不可避免地突破人与自然的边界,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如果将传统工业化的理论“黑箱”打开,就可以揭示其生态环境后果。工业化过程就是工业部门产出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在微观机制上,工业化就是工业消费品种类数(横向)和迂回生产链条(纵向)不断增加或加长的过程。其中,Dixit and Stiglitz模型开创性地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内生了工业消费品种类数,掀起了规模经济研究的热潮^②,Ethier(1982)则运用DS模型的基本方法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③。

一旦引入生态环境限制条件就可以发现,这些“完美”模拟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模型都隐含着环境不可持续的后果。其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到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或文化。物质主义不能完

【作者简介】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② Dixit, A., and J.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297-308.

③ Ethier, 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72: 389-405.

全代表人类的美好生活目标^①,而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环境危机。这种复杂的系统性危机无法依靠人的有限理性来解决。

2. 文化是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最终答案

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有其文化根源,解决危机最终也应从文化中寻找答案。但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文化的作用不仅被忽略,而且传统文化还受到“现代化”冲击。一方面,文化作为偏好和制度条件隐含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其实质作用因为“用之不觉”而不为人知。因此,各国工业化及全球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地文化经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那些缺乏包容性或弱小民族的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往往被同化而丧失主体性。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资源难以被市场化,且其作用在经济学中难以被分析。文化虽然对人的福祉有重要作用,但因为无形而可交易性(Tradability)差,也就难以在经济学模型中予以处理。相反,物质商品则由于可交易性强而适于市场化,所谓现代经济就朝着越来越物质化的方向演进。文化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带来的递增报酬特性,在标准模型中也不似物质要素容易处理。

二、中国文化为走出传统工业化危机提供出路

中国文化不仅同西方工业文明相容,而且能为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提供解决出路。中国从积贫积弱起步,其工业化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反省其弊端,进而树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历程。

1. 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可持续内涵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既有同工业文明高度兼容的一面,又同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在“用”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兼容,可以吸收其优秀文化成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中国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工业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通过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中国的文化则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是通过尊重、敬畏自然来避免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事后用所谓科学和理性解决危机。这种在大自然面前谦卑的中国文化,看似不如人类征服自然的西方工业文化那般强大,却是避免危机的更高智慧。

第二,关于发展目的或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概念。与西方工业文明强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将物质财富作为美好生活的主要追求目标,而更多的是追求修身养性、内圣外王。在物质上,强调物质适度丰裕的小康概念,反对浪费与挥霍。

这两个本质区别意味着,对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中国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工业文化的回答。当面对工业化危机寻求解答时,中国的文化基因其实就蕴藏着解决危机的大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化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却率先提出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的文化根源。

2. 中国文化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价值凸显

无独有偶,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却同西方文化中被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一些深刻思想内在一致,其中甚至包括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和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等人未被熟知的深刻思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是由一个幻觉所驱动,即以为物质财富带来幸福。凯恩斯1930年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更强调“生活的真正价

^① Scitovsky, T. The Joyless Economy: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Satisfac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值”,并指出“我们不应高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过于偏重对经济问题想象出来的重要性,而牺牲掉那些在意义上更加重大、在性质上更加持久的问题”。

上述思想意味着,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转变到新型工业化。但是,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西方主流工业文化,似乎无法从根本上为这种深刻转型提供支持,只能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走向不可持续危机。此时,中国文化对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引领价值就凸显出来。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代表中国在解决全球可持续危机上的努力,其实质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定义。

三、中国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中国工业转型,是对工业化的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包括为什么工业化(Why)、工业化的内容(What),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How)。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第一,企业价值创造方向的转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方向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绿色发展则意味着,以新能源、智能汽车等为代表的大量新兴绿色产业兴起,同时工业产品不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可以内涵大量的非物质内容。这样,企业创造的价值,就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资源高投入,更多的是转向依赖技术、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无形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

第二,企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上述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就更多地依赖无形的技术、知识、文化、生态环境等具有非竞争性特质的无形资源。这意味着,企业递增报酬的来源不一定非依赖规模扩张。这种无形资源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其价值。由于企业将何种要素纳入企业的组织边界之内取决于何种组织方式的效率最优,企业价值方向和资源概念的变化就推动最优企业组织模式有了新的含义。传统的大规模、集中式、同质化企业组织方式,就更多地被平台化、分布式、跨界式等组织方式替代。

第三,商业模式的转变。随着工业4.0到来,以及价值创造转向大量依赖无形的非物质资源要素,商业模式就会不同于过去产品主要满足物理功用的模式。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意味着产品价值创造过程的终结,但在绿色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可能只是盈利的开始。例如,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大量利润可能来自售后的增值服务和软件更新。这可能深刻改变依赖物质商品数量扩张盈利的传统商业模式,从“薄利多销”转向“卖得少、赚得多”的可持续模式。

第四,市场结构的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以流水线方式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在非人格化(Impersonal)市场中售卖。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买者和卖者的特质在市场中无关紧要。这种流水线加非人格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本来可以内涵于产品的大量无形价值被过滤掉。在绿色发展模式下,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无形价值。目前广泛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Personal)市场回归的表现。

第五,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企业更多地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需要在考虑包括环境主体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企业行为模式及其社会环境后果就会发生深刻转变。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季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形态理论作出创新性贡献

现代化代表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彰显着不断革新的人的生存状态。现代化始发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此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为“范式”，这也导致“现代化=西方化”的认识和误读。而基于中国发展的实际经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形态理论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

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表现为多层次、多阶段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是人类新文明通过文明逻辑和要素的创新、竞争和更替而实现的对旧文明的扬弃和超越。

现代化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体现了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愿景和追求。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和商业逻辑为主导，追求个人私利和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和文明成果。但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出现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异化现象，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逻辑为主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性地提出了利用并规制资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破解西方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对立困境，从而实现了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建构与系统性阐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和世界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智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现代化模式。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定探索、砥砺前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实现了国家富强、经济腾飞，更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世界提供了具有人民性、多样性、持续性、普惠性、坚定性的现代化范式，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注入了深远的文明意蕴。

2. 以文化传承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表现。文化原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养，其最初含义与农业文明直接相关，在后来的引申使用中逐渐含有教化之

【作者简介】季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意,指人类社会的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①。而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善意关系。文明与文化二者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所独有的现象,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互通。同时,二者之间也有区别,从时间上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从空间范围看,文明可以包含多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实体,其地域范围比文化更广;从价值判断上看,文明一般倾向于正面的,文化则是中性的,文明往往是指好的或优秀的文化,而文化本身则有精华和糟粕之分。^③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中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的新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既包括传统的文明成果,也包括当代的创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④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红色革命文化,凝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展新文化、开拓新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3.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古中国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继承发展,在本土生根成长,也不断向外吸收兼容,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实践探索,也是理论创新,为人类及社会发展开拓了道路,为人类文明形态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既往对“现代化”的刻板模式,从多个方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文明相比,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全面性、人民性特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文明道路选择。

二、历史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步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蕴含着独特的历史逻辑,这在中华民族文化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多个维度

① 参见张振亮:《信息社会学:信息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图景》,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0年,第35页。

② 参见余建忠、李瑞生:《大学国文》,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29页。

③ 参见李淑梅、宋扬、宋建军:《中西文化比较》,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④ 参见《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和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线索。

1. 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文化滋养

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始终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数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数千年间,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孕育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绵长丰厚的文化自信和发展动力。中国人民还向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创造了代表当时世界文化发展高峰的诗词歌赋、礼乐教化、经史子集等古代文明成果。从历史传承的连续性考察,世界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赓续至今并延续发展,持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滋养,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五千多年文明史孕育的、其他现代化无法比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不断遭遇挫折和挑战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的侵略胁迫下开启了学习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和思想行为层次进行了各种现代化尝试。如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试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新式工业、推广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但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宣告了这一探索的破产。在中国共产党走上历史舞台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均以失败而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曾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两大使命。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参与其中。经过反复探索,论争终于取得了一定共识:中国现代化既要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又要传承本国优秀历史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3. 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和现代文明的壮美蓝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寻求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逐渐发展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人民民主为使命,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战,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任务。1954年,周恩来着眼于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首次提出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任务。1964年,“四个现代化”建设被确立为中长期发展战略。此后,现代化发展目标逐渐清晰,1979年,邓小平根据当时中国落后、贫困的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建设构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三位一体”及“三步走”发展战略,“富强民主文明”成为总体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富强民主文明”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丰富了党对现代化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征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中国现代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探索进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复兴全局和世界变局,推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统筹联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奠定了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擘画了更加壮美的蓝图。

三、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开拓了人类文明形态探索的新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忽视人民利益的“苏联模式”,摒弃了“资本至上”的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又在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开辟发展的新道路,开拓了人类文明形态探索的新方向。

1. 在主体层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人民的主体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一百多年来,我们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中国能够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长期坚持自我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是惠及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性”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马克思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②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标识,兼顾发展与民生,正确处理了分配问题,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和制度条件。

2. 在国家层面,坚定特色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文明形态发展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方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顶层谋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内容,在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和丰富成果,在文明维度上成为全新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构成。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已有文明形态的实践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③,社会主义文明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更高文明形态。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3. 在社会层面,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立足国情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①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24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定道路自信,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中国国情来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①

在顶层设计上,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制定好把握规律性的规划和政策体系。在执政方式上,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激发市场活力、保障经济稳定。在实现策略上,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集中力量,统筹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将优势要素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进步;平衡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促进经济发展均衡;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精神文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更是超越了传统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认知,不断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走向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更实现了人民美好生活、物质和精神文化富足,还发展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意蕴,让我们的民族精神屹立在世界之林,为全人类探索现代化之路、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Stud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U Shou-ying, LAI De-sheng, DU Yang, ZHANG Yong-sheng, JI Wei-min

Editor's Note: On June 2, 2023,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tended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comprehensively expound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overall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he important speech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guide for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theory, deepen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buildi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we planned a special written discussion, invited five scholars to exchang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provided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for further promo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researchers.

Keyword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24 O20 N01

[责任编辑:王燕梅]

^① 参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人民日报》,2023年3月4日,第13版。